



波兰大使授予易丽君“波中建交65周年纪念勋章”

202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七,我一整天都在北外主楼办公室翻译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故事》。晚上6点,刚进家门,看到赵刚老师的未接来电,没来由地隐隐有些不安。回拨电话,惊闻噩耗,痛哭失声……

初一去拜年时,易丽君先生生气色不算太好。得知我正在翻译第二部托氏作品,她还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答应易老师,等夏天译作出版,要第一时间送来给她看。托卡尔丘克是易丽君、袁汉密伉俪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他们的译作《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彼时我还没有毕业,对文学翻译一知半解,只觉译著文字精妙隽永,读来唇齿留香。不禁畅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将这些奇妙的拉丁字母组合变成一个个方块字,变成一串串流畅动人的句子。后来,在先生鼓励、提携和指导下,我开始研读托卡尔丘克的著作,写有几篇专题文章,翻译了《怪诞故事集》。

先生离世后,我控制不住,反复回想初见先生的场景。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波兰语不久,那天我们一起乘车前往波兰驻华大使馆参加一个电影招待会。40分钟的路程,易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波兰文学及文化的知识,很多内容已然记不清,但有一句话刻骨铭心:“学好波兰语,好好地把波兰文学翻译出来。那么多的好作品,不翻译出来太可惜了!”今天想来,先生真真是用她勤谨治学、淡泊名利的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1954年,易丽君教授受国家选派,从武汉大学中文系赴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后来她常会给我们讲起那段艰苦而充实的学习经历:“国家派我们出去不容易,每年要有好多个农民种地,才能培养一个大学生留学,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学习。那时我只读了一年语言预科班,就和波兰学生一起学习波兰文学了。头两年,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就课后借了波兰学生的笔记来抄。后来,从第三年开始,就是波兰学生管我借笔记了!没有地方学习,我就跑到波兰的教堂里,坐在最后一排,好多波兰文学的经典名著,就是在那儿被我一本一本‘啃’下来的。”青年时代的先生,全身心地徜徉在波兰文学海洋中,以惊人的毅力完成学业,取得优异成绩,为日后的讲授、翻译和研究波兰文学打下坚实基础。

196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易丽君教授先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苏联东欧部任编辑、记者,1962年调至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欧语系(现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任教直至退休。她深爱教学,全心投入,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过十多门课程,在出版条件匮乏的年代编写了大量教案。她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波兰语人才,学生们活跃在我国外交、经贸、文化、宣传、教育等各个领域。易教授于1995年和2007年两度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

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直教导我们要“先学做人,再做学问”,坐得住冷板凳,宠辱不惊。她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以广博学识教书育人,以高尚品格影响后辈。2007年,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因“出色的翻译成就、艰苦的教学工作和与波兰科研机构合作的典范行动”,授予易丽君教授荣誉博士学位。我作为波兰语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随团陪易老师赴波兰领奖,第一次目睹易老师是如此受学生爱戴。在中国驻格但斯克总领馆、中波邮轮公司工作的波兰语校友们争相拜会先生,一叙师生情。那时,我就愈加坚定了站稳三尺讲台的决心。后来,我几乎每年都陪先生伉俪赴波兰领奖、出席研讨会,大家都笑言跟着易老师就不会饿肚子。

先生胸怀广阔,关心波兰语教育事业发展,是中国波兰语界的指路明灯!2009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新建波兰语专业,易老师专程前往出席开班仪式,并给予诸多指导。2014年,先生的学生茅银辉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建波兰语专业,得到她的格外关注,常笑称广外波兰语是自己衣钵的岭南传承。在先生自己都无法记清的那一次次会议和活动中,她风趣、通达、哲韵悠然的话语,每每让大家醍醐灌顶、如沐春风,打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波兰语学子。

《世界文学》主编高兴说过,“如果我们去关注易丽君的翻译之路,基本就是随着她大致浏览了一遍波兰文学史。”这种评论一点不为过。从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到大文豪显克维奇,从诗人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到当代小说家托卡尔丘克,从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到荒诞派、后现代,先生翻译了数十部波兰文学作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均有涉猎。她翻译的波兰散文名篇《草莓》,被数十种报纸杂志

追忆易丽君先生

□李怡楠

易丽君,著名波兰文学专家、翻译家,1934年生于湖北黄冈。1954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到波兰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1962年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她曾获得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文化功勋奖章,2018年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易丽君译有《先人祭》《火与剑》《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等作品。2022年2月7日,易丽君在京逝世。

转载,入选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很多北外波兰语和其他语种学生入校前就曾为之惊艳。及至入校,很多年轻人不禁感叹,“方知大师就在身边,何其幸运!”

除了翻译文学作品,易丽君教授还撰写有《波兰文学》《波兰战后文学史》《波兰20世纪诗歌》等专著,这些拓荒性的作品为北外乃至全国波兰文学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易教授因其在中国推广波兰语言文学被波兰共和国议长提名并获得波兰科学院波兰语言委员会授予的“波兰语言文化大使”称号。我有幸随先生伉俪赴波兰领奖。其间波兰友人邀请我们参观陈设有波兰骑士服饰的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二位老人兴奋地讨论着,易老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对丈夫袁汉密说:“老头,你看怎么样,我就说这个兵器是这个样子的,我翻得没错!”见随行波兰友人有些茫然,易老师才解释说,在翻译《十字军骑士》的时候,二人常为某件兵器或某种衣饰的译法争执不休。这种争执在二老翻译《费尔迪·杜凯》等很多作品时都会有,也是这种“锱铢必较”,令一部部署名“易丽君、袁汉密”的译本成为传世之作。

2018年,易丽君教授荣获中国翻译家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亦是对先生一生贡献的高度肯定。人们不禁第一时间想起被称为“报春燕”的《先人祭》。这部“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译著,是易丽君教授在随北外转至湖北沙洋办学时期完成的。在一间夜间经常无人的小棚屋里,易老师在煤油灯下一字一句地将原著主人公的吟诵译成中文。夏天蚊子太多,翻译间就变成宿舍里挂着蚊帐的床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先生断断续续译出了《先人祭》第三部的初稿,回北京后,她利用空隙时间和各种机会查找资料,解决疑难问题,补充完善初稿。2009年,我随易丽君教授前往波兰西里西亚大学参加波兰文学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时,她在主旨发言中提到了这段译介往事,易老师还引用了主人公的一段独白:“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怎么办?怎么办?”紧接着她又略带幽默地说,“到处是沉默,到处是黑暗,可我知道,光明总会

到来!”瞬间,台下掌声雷动。先生接着说,“我的时代终会结束,接下来,我寄希望于乌兰、李怡楠(当时的中国学者代表团成员),希望她们接过我的笔,继续从事波兰文学翻译。”今日忆及,泪如雨下。

先生是中国波兰文学翻译界永远高扬的旗帜,一生从未放下那支翻译之笔,耄耋之年还陆续翻译出版了《伏沃迪约夫斯基骑士》(与袁汉密合译)、《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大象》(与茅银辉合译)等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她还在和赵刚教授讨论着米沃什名作《伊萨谷》的翻译工作。

先生对波兰文学翻译事业薪火传承有一种厚重的使命感,她亲自培养的三位博士赵刚、乌兰、茅银辉都在她的鼓励下走上了波兰文学翻译之路,成为今天中国波兰文学翻译界的中坚力量。而我,更是清楚地记得,先生让我代表她出席读者分享会,督促我把自己对波兰文学的理解分享给读者,鼓励我把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讲给读者听。易老师,“最后的故事”我也会努力讲好,不管您看不看得到,我都要讲给您听。

二月北京的空气格外清冽,让我无比清晰地想起坐在北外西院塔楼中的那位将波兰文学史娓娓道来的老人。2004年,我本科毕业后正式成为易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不想开学后,用教学的东院主楼装修尚未完成,于是易老师家里的书房就成了我的研修室。先生用纯正的波兰语和她带着湖北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们讲科哈诺夫斯基动人至深的《哀歌》,讲密茨凯维奇浪漫玄妙的《先人祭》,或在课间和我们分享坐火车前往波兰留学时,连续几天几夜看到茫茫贝加尔湖的奇特经历……那间书房里,除了一台过时的、易老师永远也搞不懂的电脑和一张简易沙发,就是满墙满屋的书籍。偶尔在客厅里小坐,可以看到大大的电视墙上一台被各种奖状奖杯包围起来的小小的电视。先生已是纯粹、通透、真性情的老人,生活上异常简朴,真正是“三尺讲台,两袖清风”。她从不置任何名牌服装,只有穿上女儿从美国带回来的衣服或者鞋子时,会开心地问我好不好看。先生偏又为人豪爽,最喜欢笑哈哈地说“我请客”,如今想来,这二十多年里,在我每次彷徨、苦闷、犹豫之时,在这“陋室”之中,先生三言两语间启发、点拨我的一幕幕,犹如昨日。

先生离开的这两天,来自中波两国教育、外交、文化、出版等各领域的机构、人士纷纷发来唁电。身处世界各地的故交老友、学生后辈哀痛万分,以各种形式寄托哀思。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更深切体会到,易丽君教授是我们真正的大先生。

为中国波兰语教育和中波文化交流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易丽君教授离开了。她一生安贫乐道,不求闻达;诲人不倦,桃李天下;勤奋治学,著作等身;篇篇经典,字字珠玑。

先生卓越成就已是中波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先生高山仰止令两国学界景行止。我之后辈,难望项背,唯有沿着先生开拓的那条路,勇毅前行。每有寸进,聊慰师恩。



《平凡的世界》马来西亚版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由路遥于1986年创作,马来文版名为《Di Mana Ranting Dipatah—Sebuah Dunia yang Luar Biasa》。这本分成三部出版的百万字小说耗时6年完成。路遥曾获茅盾文学奖(1991年),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该小说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除此之外,《平凡的世界》也被改编成电视剧(1990年和2015年)和舞台剧表演(2017年)。这本巨著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文、阿拉伯文、日文、土耳其文和越南文。

由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出版,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协助推出的《平凡的世界》马来文译本使用的是较为短篇的“普及本”。2021年10月16日,该书编辑札蕾哈(Zaleha Ahmat)和广西民族大学马来文语教授赵丹就《平凡的世界》马来文版与读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

札蕾哈分享了选择译本题目的过程。虽然这本写实小说里充满了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故事,但其角色们为了逃离贫穷生活,选择了自我革新,他们所面临的对抗和矛盾则让该书读起来别出一格。“Di mana ranting dipatah”取自马来文谚语“Di mana ranting dipatah, di situ air disauk”(树枝断裂之处,定有水源可寻),正好反映了这些角色们在走向不同的生活道路后的生活方式。选择使用马来文谚语命名书名比起使用原名的直译,即“Sebuah Dunia Biasa”更符合文学和美学价值。

谈到书里的革命情节,札蕾哈表示,书里的角色们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各自的革命征途,最终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路遥把自己读过的苏联、法国和英国小说写成平白的阅读清单,从而彰显了作者本身的思想革命。少平决意离家求学,少安虽然选择留在村里,但他那开放的思想最后也成功地改变了家人和村民们的命运。“只要我们改变观念,身边的事都会随着改变。”她说。

两位嘉宾接着谈到了书里两位主角——少平和少安的成长。少平出生于贫困家庭但为人谦卑,且拥有探求知识改变命运的强烈意志,他的成长有赖于帮助他敞开思想的阅读清单;少安虽然选择留在村里,但他那开放的思想最后也成功地改变了家人和村民们的命运。

赵丹教授告诉马来西亚观众,这本小说至今为止依旧对对中国年轻一代有极大的影响,主要因为城市和乡村还是有很大经济差距。小说里的角色们的经验和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想要改变命运的人十分相近,年轻人会以少安和少平为榜样。即使50年已过去,但小说里清楚不变的主题,例如革命精神、友情、勤奋、慷慨、为善等人文价值,让路遥这本小说依旧长销不衰。

对于马来西亚读者来说,该书的译本不但能让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更能提升读者的修养,使读者成为更好的人。札蕾哈也提出了两本与《平凡的世界》形成呼应关系的马来西亚文学作品: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有已故马来西亚国家级作家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的《Ranau Sepanjang Jalan(满路荆棘)》;从思想价值和主题的角度,则有作家沙阿立依沙(Shaari Isa)一套三辑的《Lepaskan Kembari Aku Ke Laut(归海)》。

(作者努努·菲道斯阿都拉昔丁,任教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变革

《平凡的世界》在马来西亚

东亚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世界化问题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访谈

□朴宰雨 张乃禹

仁先生的《中国需要鲁迅》、孙郁先生的《鲁迅与现代中国》的翻译。

张乃禹:韩国比较重视本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较早就提出了文学世界化的口号和目标。据我所知,您还是韩国文学翻译院的理事,请问韩国文学翻译院的设立背景,具体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如何?

朴宰雨:上世纪90年代,为了将韩国文学译介至海外,推动韩国文学的世界化进程,韩国成立了文学翻译基金库,但这个机构规模较小,成效不大。2001年,隶属于韩国文化光观部的韩国文学翻译院正式成立,成为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特殊法人机构。鉴于韩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巨大,韩国文学也应该有一席之地,由此韩国文学翻译院在文学作品翻译、翻译人才培养、文学交流互动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现在覆盖的语种超过二十种之多,直接将翻译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行。同时韩国文学翻译院还创办了中英两种语言的专门刊物,向海外推介韩国文学,内容包括书籍、作家访谈、出版信息以及文学热点等。

张乃禹: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彰显和文学的对外传播成为重要议题。由此,中国文学和学术就面临着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对此您持何种见解?

朴宰雨:就海外汉学家的感受来说,现在中国正通过各种政策的落实,比较重视中国文学和学术“走出去”问题。一个是对中华优秀典籍外译的推动,一个是中国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也积极支持外译,据我所知,莫言的散文外译就是受到这个项目的资助。还有一些政府奖项,比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表彰介绍、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机构,这些举措有效激励了海外翻译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中国文学有“走出去”的意愿和具体措施,但是海外能不能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经常讨论的“走出去”与“走进去”的问题。我认为应该从海外的具体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翻译的作品必须契合当地的阅读意愿和阅读期待,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之前的中国作品外译纯粹是偶发性的,全凭译者的兴趣和偏好选择译本,站在“拿来主义”的立场上,翻译一些符合当地需要的作品,出版机构也面临盈利与亏的抉择难题。如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各种激励性措施,中国文学的外译逐渐实现了规模化和系统化。虽然也存在一些并非完全契合当地实际需要的译介个案,但由于中国作品译介数量的激增,作品被海外读者深度认同的几率大大提高,所以整体来说,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文学“走出去”措施确实正在发挥着正能量。

张乃禹:您认为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可以从韩国文学的世界化方面得到哪些启示?

朴宰雨:中国作家协会隔年举办一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每次会议都会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多位汉学家参会,我曾多次在会上介绍韩国文学世界化的经验,中国作协也表示有所启示。但韩文的世界影响力远不及中文的世界影响力,就文学的世界化来说,虽然韩国开始得早,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对文学“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所取得成就也有目共睹。

但外国读者阅读中国文学,更多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中国人的内心思想,而不是从艺术层面上欣赏。比如看刘震云的小说,外国读者可以参悟到中国人的内心机制,在利害关系面前的表现和个人欲望的外在表达等。当然,中国

文学艺术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需要外国读者通过译介来发掘。至于韩国文学世界化的启示,我认为韩国文学翻译院等专门机构的规划设置、运行模式和运作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的“他山之石”。

张乃禹:您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和学术世界化之间的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朴宰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方法论和问题意识可能与国内学者不同,但通过交流互动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促进。毕竟汉学家身处海外,在信息搜集、资料获取方面可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互动实现;而中国学者通过与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接触,可以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方法论、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等,对自身研究视域的拓展也大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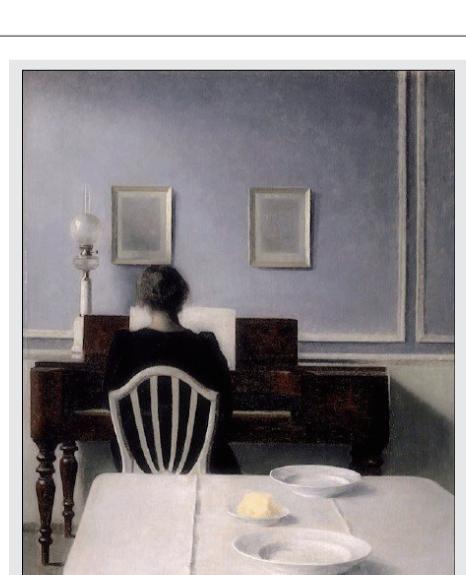
此外,海外汉学研究可以在中国文学译介对象的确定方面,提供重要参考,选择何种作品进行对外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汉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汉学家的个人兴趣。其次,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评价也影响着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由于汉学家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学术话语权,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方面,可以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通过研究和批评等学术性活动,使译作深入读者内心和研究者视野,最终实现提升译作海外影响力的目的,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和学术走向世界。

张乃禹: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渊源使“东亚”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场域,您也曾作为中日韩东亚文学论坛的重要发起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当代东亚文学的交流和互动。请问在中日韩文学交流和研究方面,“东亚文化共同体”是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朴宰雨: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想象性存在,与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The

Imagined Community)”的内在理路存在契合性。东亚文化共同体没有实体,只是一个想象的产物,只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才有实际效果。韩国较早就提出“东亚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但由于容易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曾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因此这一构想并没有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回应。后来中日学者都逐渐表示认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所以,你所说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作为某种方法论,我认为很有意义和必要。

(张乃禹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朴宰雨系著名汉学家、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韩国》韩方主编等。)



丹麦画家Vilhelm Hammershøi作品

世界文坛
SOCIETY WENTIAN